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打破官本位，社会更和谐

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为我们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它使我们可以对官本位体制下所蕴含的种种理念和假设进行批判，并思考如何通过采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来破除人们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来强化以人为本的导向。

在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批评权势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常常公权私用，或者作为社会优势群体恃强凌弱，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权。这些现象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招致了人们对权力本位和官本位制的批判。作为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人们常把官僚主义、腐败和特权问题与官本位制联系起来，甚至把官本位制看成是各种社会病态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体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为人们所诟病，包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制约，促使民营企业家的外流，维护社会强势群体的特权，以及公权私用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不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司法体制改革，其根本点都会触及官本位问题。这种状况反映出官本位体制所形成的社会问题正在日益严重，而且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

社会舆情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从大众舆情的反映来看，民众对于目前官本位制的盛行给予诸多批评。在民众的眼里，官本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更与现实利益相关。为此，在推进社会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时，政府提出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目标。这些主张和政策导向与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相适应。

在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中，官本位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打破这一症结才能够使中国社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特别是在今天，这一体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僚体系本身，而且也涉及市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导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因而，这一体制对整个社会发生全面的和基本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市民社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也注重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并且在各地的地方治理中出现了诸如杭州市政府提出的“社会复合主体”的理念来进行城市治理，这些实践有助于推进民间组织发展和公民参与。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学者和媒体已经把其关注点放在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质量的增进、人们幸福感的诉求等问题上，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就公民本位的分析而言，它弱化了以权为本的思想，而将关注点由社会地位和权力金钱等外在的评价标准转向生活方式和人的价值等内在的标准上来。它促使人们对权力的屈从现象日益淡化，而公民权的理念和法治精神逐渐成长起来。由此，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为我们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改造进程，形成充满活力的社会体系。同时，它也使我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对官本位体制下所蕴含的种种理念和假设进行批判，并思考如何通过采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来破除人们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来强化以人为本的导向。

（2013 年 11 月 6 日《新华日报》林卡）

泛道德谈问题是没用的

乘公共交通工具不排队，它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供需的经济问题。由于供给少，错过了一班车就会误了很多事，拼了命地抢上车当然成了常态，不抢着上车才是傻瓜。

因此，乘车不排队、抢位子，表面看当然和道德有关，但实质看，它和道德无关，只是公共交通工具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去改善供给而硬要说是道德问题，那就会造成表面上有排队，但车一来照抢位子的现象。这是一种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自欺欺人。这是伪善，它比不排队的不道德更为严重。伪善会造成道德感的麻木。

谈问题有谈问题的方法。泛道德意识因为最容易、最廉价，因此用道德谈问题最为普遍，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据，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在此可举贪污问题为例。

柏拉图在《共和国》里谈到正义时曾说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故事。在小亚细亚有个古国吕底亚，有个牧羊人叫盖吉士，有次牧羊时大地震动，他掉进了裂洞里，在洞里捡到了一枚戒指，如果他戴了戒指，把戒面朝外，他就会被人看到，如果把戒面朝内，他就可以隐身，别人就看不见他。发现戒指有这种魔力后，他就隐身进了皇宫，诱拐了皇后，后来与皇后合作，杀了皇帝，他自立为王。由于他有戒指，做尽坏事，别人却看不到，于是他遂可以为所欲为。

柏拉图说，秘密乃是违反正义的最大原因，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会被人看见，正义对他就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因为受到柏拉图这个故事的启发，西方遂认为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的反贪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的原因。1993 年全球成立了最大的反贪组织，就叫做“国际透明组织”。政府的透明乃是一个可以客观检证的问题。瑞典之所以贪污绝迹，就是因为瑞典的政治透明度举世第一。

因此，西方的反贪是把政治的透明列为核心，当政治都透明，就不可能有藏污纳垢的黑箱。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以道德谈贪污问题，要防止贪污，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这些都是道德性的手段，而不是透明这种制度性手段，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遂出现大家都说清廉，但人人都阳奉阴违的恶果。

（2013 年第 9 期《南风窗》南方勇）

◆文 坛

一部电影与一段真人真事

——与原型人物李白相关的故事

20 世纪中期，有一部著名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该片真实表现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地下电台岗位上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感人至深，令观众肃然起敬。

影片中的主人公李侠，其原型就是我们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之一李白。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我有幸与李白同在一个部门（中央社会部）工作，成为他的晚辈同行，并作为报务员负责与上海李白领导的地下台联络。1948 年末，李白最后一次向西柏坡中央机关发电报遭到不幸时，我正是他的对方报务员。

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联络上海的一个地下台。我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同志姓甚名谁，但从空中电波交往中，已能感受到对方在技术上是一位干练的老手。每个人的发报手法都不一样，手法熟练不熟练，有什么毛病，一交手便知。而我的对手手法熟练、流畅、纯正，绝不拖泥带水。对一个报务员来说，能碰上一个这样的对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更是如此，每次联络完毕，我都感到心情愉快。

三个“V”字的紧急危险信号

就在两个月后，不幸突然降临。

那是 1948 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络不久就遇到异常情况。先是对方给我发报时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估计是敌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电台），然后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把电报发过来。紧接着，对方连续发了三个“V”字的摩尔斯电码：嘀嘀嘀哒、嘀嘀嘀哒、嘀嘀嘀哒。按秘密约定，这是他在示意我：他正在处于危急险境！再往下便音讯全无，连平时彼此的习惯语“GB”（英语缩略语“再见”之意）也没有来得及拍发。

我赶紧将收电交给党台领导刘富龙，向他报告对方遇到了危险。然后，他要我继续上机守听。可是一连数日守在收报机旁，却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信息。领导当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要我停止收听。

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对方就是李白电台

上海地下台失去联络后，我心中始终有一个悬念：和我联络的人究竟是谁？他遭到了怎样的不幸？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从军委机关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80 年代从高校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访问了许多有关老同志，悬念终于得以解开。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曾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请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上海地下台李静安（即李白第一次被捕获释改用名）的下落。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组织精干力量，经过艰苦调查，终于查清：李白于 1948 年 12 月 30 日晚在与中央社会部电台联络时被敌特侦破被捕、关押，被严刑拷打致残，始终坚贞不屈。李白与关押在一起的 12 位同志，都在上海解放前 20 天，即 1949 年 5 月 7 日被敌人枪杀于浦东戚家庙。在陈毅市长“血债要用血还”的指示下，枪杀李白等人的凶犯得到了应得的惩处。

李克农部长的专电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查复，成为我得以释怀的有力证据。因为：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只有我联络的电台发生了不幸；李白被捕的时间和与我中断联络电台的时间相吻合。

1945 年 8 月，李白夫妇住进上海黄渡路 107 弄 15 号。这个住处的小阁楼，就是他每天深夜与党中央通报的工作场所。就在这里，他向党中央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后来查清，这份电报的内容，是关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布防的情报。这是李白为解放军胜利渡江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情报。

2010 年 10 月，我和老伴在参观上海世博会期间，曾到李白生活工作三年多的旧居黄渡路 107 弄 15 号“李白烈士纪念馆”参观，并同李白之子李恒胜及纪念馆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聆听了烈士就义前告别妻儿的动人情景。当时惨无人道的敌人已将李白拷打致残，不能独自站立，只能靠同牢战友的搀扶，他才站立于牢窗前眺望远处的妻儿。他没有丝毫悲戚，只是用眼神向妻儿示意：天将大亮，大地即将重光。他那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2013 年第 8 期《百年潮》苏采青）

◆评 论

不必过于苛求实名举报

实名举报，的确有助于腐败案件的快速查处，对纪检监察机关来说，当前也最需要公众的实名举报。不过，“越实名举报就越安全”的说法却不被认可。一方面，目前实名举报的风险仍然较大。就当前我国的法制环境来看，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受权力的左右和影响，公民实名举报之后难免会暴露个人及家庭、亲友的相关信息资料，也极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甚至威胁，令举报者有后顾之忧。真正完全实名举报的时机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公众实名举报的意愿并不强烈。从实践来看，在各类举报中，实名举报所占的比例很低，这说明公众实名举报的意愿并不强烈，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反腐勇士”或“反腐斗士”。

其实，对于网络反腐而言，不必苛求必须实名举报。纪检监察机关不要总希望举报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证据，也不要总希望举报者勇敢站出来，指认腐败分子。对于匿名举报，余下的工作需要反腐机关从举报中发现蛛丝马迹，随后的深入调查取证也应该由纪检监察机关的人员来完成，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而非完全依赖举报者的提供。

所以，对于网络举报，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鼓励，无论是实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只要是举报就欢迎，就认真对待，落地核查；另一种就是有效保护，无论是实名举报者，还是匿名举报者，都需要给予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是个人信息的保护，而且是人身安全的保护。如果只关注实名举报，而冷落匿名举报或者对匿名举报置之不理，显然并不是反腐工作的根本要求，甚至还可能会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调查时机，让腐败分子做好了应对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转移财产，销毁证据，串通口径，直至溜之大吉。如此，反而是反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

（2013 年 9 月上《领导文萃》唐卫毅）

中国需要多少核电产业园

前不久，浙江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海盐中国核电城的《中国核电城规划》。海盐中国核电城是依托中国核工业集团在该县建设的秦山核电基地而创建的中国第一个核电关联产业基地。核电城集设备产业区、科教商务区、生活区、运行服务区、生产区五位于一体，规划范围达 130 平方公里。规划提出，到 2015 年，要实现核电服务产值 100 亿元，其中核电设备制造业产值要达到 50 亿元。截至目前，海盐核电城关联产业入驻企业达 40 余家。

众所周知，核电产业是高技术产业。该产业的发展，硬实力方面可拉动一个国家工艺设计、机械制造、钢铁冶金、电子仪表、建筑材料、地勘矿冶等诸多领域发展，软实力方面可促进科技研发、企业管理、文化融合、员工素质等方面的能力提升。中国核电发展，经过了 30 多年的风雨历程，目前进入安全快速发展阶段。为其配套建立若干个相关联的工业产业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围绕中国核能产业规划，到 2020 年建成 6000 万～7000 万千瓦、在建 1800 万千瓦核电机组的大盘子，中国到底需要多少核电产业园是合适的？目前尚无人做过研究。

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国内已建核电产业园的有深圳、武汉、南京、（山东）海阳、（浙江）海盐、上海、大连、北京、广东等地。这些产业园，有的依托于正在建设的核电基地或运输便利的港口，有的则无依无靠；有的是综合类基地，有的则是单一的设备制造基地；有的是政府与企业联手，有的则是企业单打独斗。中国快速发展核电，建立核电关联产业园是必须的，但是否需要如此之多的产业园，值得思考。

凡成功的产业园，首先要具备人才队伍、研发能力以及强大的技术支撑力量。北京的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之所以成功，就是得益于其拥有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研发实力和精英人才以及开放的理念。而目前各地正兴建的核电关联产业园，是否具备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会不会出现未兴先衰的局面？

据披露：多个工业园深陷“空城危机”。中部某市万亩工业园普遍存在厂房空置、工业用地撂荒现象，“像空港物流园区、江苏工业园区，都只是个空架子”。鄂尔多斯多个工业园区因入驻企业稀少，开工进度延迟，呈现出一派“工业鬼城”迹象。

再谈谈中国的核教育。10 年前，中国有涉核专业的院校仅七八所，但时隔几年时间，涉核专业院校猛增到 40 余所。不管是否具备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匆忙上核专业，其实都是冲着核电产业这块“肥肉”去的。但当遭遇福岛核事故冲击时，除少数有实力的院校继续坚持挺立潮头外，不少新兴核专业不是招不到生源，就是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对此，业界人士忧心忡忡。当年寄托着不少政府或企业“产业转型”梦想的工业园、产业园，而今成了“空城”“鬼城”。这一现象，应引起政府及企业决策者的警觉。中国核电关联产业园，要防止重蹈“空城”覆辙，同时也要防止出现核教育那样“群雄乱起、遇变则衰”的现象。

（2013 年第 4 期《中国核工业》秦风）

◆纵 横

人性的亲证

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的结尾处，描述了一位党卫军军官以讥讽的口吻训诫囚犯：“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书写。”他继续叫嚣：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针对犹太人的战争都已获胜。囚犯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却无法下定论。因为所有证据都被毁灭，连同集中营里的囚犯。

这位党卫军军官显然低估了人类理性和认知的能力。纳粹政权被摧毁不久，集中营的真相便被曝光，巨量的材料诉说着曾经发生在那里的种种罪恶。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是一位幸存者，他用细腻而沉重的笔触描述了集中营里的悲剧——刽子手不只是党卫军，许多是普通人，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个人身边。

莱维是化学家，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捕，成为集中营囚犯。因其专业技能，被纳入囚徒中的“特权阶层”，有幸躲过死亡并熬到解放，从而以更好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观察集中营。他在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提供了特殊的视角：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

人们常以“他者”的眼光去看待集中营，看到一个绝对的二分世界：统治者和囚徒。纳粹党、党卫军是邪恶的、残忍的，而囚徒是善良无辜的。这并不能准确反映那里的全部图景，因为在囚徒之间也存在混乱的战线，横亘于相互之间。因而，暴力并不仅仅来自党卫军的管理者和看守们，通常还来自囚徒自身。

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自己面临的唯一结果是死亡。这意味着必然会展开囚徒与囚徒之间的生存竞赛。他们并不是“典型的囚犯”，绝大多数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只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被抓进集中营。他们既没有天然的恶行，也没有天然的优良品质，突然被剥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所有正当性，为了活下去，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加丑恶。

一些囚徒选择与纳粹合作，犹太特遣队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们负责操作焚尸炉，得到的“特权”也仅是死得更晚一些，并在剩下几个月里能吃饱。党卫军千方百计让特遣队员无法说出真相，工作一段时间后即将其集体屠杀。

此种状态下，“不要理解”成为集中营的生存逻辑。试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显得痛苦而徒劳。因为“死”是必然结果，怎样活得更长才是唯一有意义的智慧，必须用更多的精力、机智设法获得一碗汤、一口粥。

挖掘真相永远是一件残酷的事。但莱维认为，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虽然不容易也不惬意，却必须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

1947 年，莱维出版揭露集中营暴行的《活在奥斯维辛》。十多年后，该书被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销售数万册。可在 1961—1964 年间，莱维仅收到 40 封德国读者来信。这些信件中，有些读者对自己为何选择希特勒进行辩护。

莱维回信对其予以驳斥，他这么做倒不是要强迫全体德国人共同承担罪责，可这些人明显在通过对历史的遮蔽，消解自己作为德国人的罪恶感。纳粹上台后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对希特勒狂妄和罪恶世界观的履行，希特勒从来没有过“溢美之辞隐含的虚伪和背叛”，他从来都是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犹太人的态度。莱维对此评价：“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给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

拥有选择权利时，为了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而投身罪恶，就须付出代价。一旦极权者控制全部国家权力，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不太可能作出有效的抵抗。

莱维对极权主义的控诉理性而强烈，且时刻没有忘记对现实的考问。在相当意义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一部写给未来的书。

（2013 年第 22 期《财经》施京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 180 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